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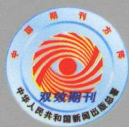
BIMONTHLY · ISSN 1000-4246

CUAA

ACADEMY SYNTHESIS LITERATURE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CHINA UNIVERSITY ACADEMIC ABSTRACTS



2008.1



著名语言学家 张志公教授
Prof. Zhang Zhigong

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特征

□ 田海龙 张迈曾

天津商学院 天津 300134

一、功能语言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韩礼德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将语言描写成“一个在语言使用中实现的意义潜势系统”(Thompson 2000/1996)。意义在这里已不再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与具体语境相脱离的抽象意义,而是与语境相关的意义,是说者希望听者理解的具体意义。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意义即是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功能”。要获取信息,可能就要使用疑问句而非陈述句,而且从朋友处获取信息时使用的疑问句可能是随意的而不是正式的文体。这些与语境密切相关的成分都构成意义的一部分。

研究语言的功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选择的问题(Thompson 2000/1996)。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就是要研究选择的范围,一方面从需要表达的意义(功能)出发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表达这些意义(功能)需要的措辞出发进行研究,但不论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都要使两套选择项相互匹配。从功能出发,就要考虑语境的问题:决定某种意义/功能比另一种更为合适得体的语境因素是什么?但是,功能主义语言学把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放在选择的另一方面:表达语境所要求的意义/功能时,哪一种语言选择项更为合适。语言选择系统提供许多词汇和结构方面的选择项,语言选择的对象在功能主义语言学看来就是语法规则。功能主义语言学在研究这些选择项被选择来表达意义/功能的同时,建立起以人际功能、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为主的系统功能语法。

功能主义语言学的进步在于,它摈弃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关于意义靠语言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确定的理论,提出意义的功能学说,把意义扩展到语言的功能系统,通过研究语言选择确立意义的动态特征。然而,功能语言学忽略了认知主体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功能主义认为决定语言选择的因素是语境,并非主观意识。人在语言交际中选择什么语言或语言变体完全由语境决定,人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选择。另外,功能主义只是研究了语言选择

的原理,归纳出一些可供选择的语法规则,即一套一套的选择项,或称之为选择系统(systems of choices)。功能主义语言学在提出语言是意义潜势系统理论的同时,其试图使语法规则系统化的语言思想仍禁锢在结构主义所追求的统一性、整体性和永恒性之中。

二、语用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语用学以研究语言运用为己任,对语言选择的研究较功能语言学更为具体,提出“运用语言必须包括不断进行的语言选择”(Verschueren 2000/1999)。这种语言选择可能基于语言内部或/和外部的原因,也可能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作出的,但是,选择的过程被看作描述语言运用的基础(Verschueren 2000/1999)。从语言运用即是语言选择这一命题出发,Verschueren(2000/1999)提出有关语言选择的三个关键概念: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是既相互联系又有等级差别的三个概念。相互联系表明,没有语言的变异性就没有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没有各种各样的变体,选择就无从谈起,也就无所谓商讨性和顺应性。等级差别在于语言的这三个特点有着严格的顺序。语言首先具有可供选择的一系列语言变体才会导致语言运用由不断的语言选择构成,而语言运用一旦成为根据不确定的原则和策略从多变的可供选择的语言变体中进行选择,交际的成功只能靠顺应来保证了。

三、社会语言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功能语言学基于对语言选择的研究,提出语言的三种元功能,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Verschueren从语言选择的研究入手,提出顺应理论,使语用学成为一种理论综观。社会语言学更注重语言选择在社会情景中的实际意义,注重研究语言选择与选择者身份地位、思想意识及其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以语言变异研究为重点的早期社会语言学中主要表现在语言选择反映出

选择者的身份地位方面。Labov 对纽约市三个百货商店的语言调查就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在这方面研究语言选择的一个代表。

与 Labov 不同,另外一些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语言选择是选择者表达自己思想意识和主动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

Gal (1998) 观察了奥地利东部欧伯沃德小镇年轻妇女选择德语或匈牙利语的情况。欧伯沃德是当时农业欧洲向工业化和城镇化转型进程的一个缩影。在欧伯沃德,匈牙利语象征着农民的社会地位,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匈牙利语意味着与农民的牵连。而德语由于象征着工业化,在人们心中享有更高的威望和更正面的联想。Gal 特别解释了年轻妇女频繁使用德语的动机。

与 Gal 对社会个体通过语言选择参与社会实践的研究不同,Heller (1995) 的研究涉及到机构通过语言选择实施象征性控制 (symbolic domination) 的问题。象征性控制指社会集团通过将自己的观点和文化实践确立成最有价值的标准来保持对其他社会集团的控制。

社会语言学将语言选择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同时,对语言选择目的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语言选择的目的是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不是表示语言的功能,也不是交际得以成功进行的工具,而是语言选择者构建自己社会身份、地位,参与社会变革的手段。语言运用者的主体位置被真正确立起来,从而动摇了将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分离、孤立研究语言封闭系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根基。

四、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对语言选择的多视角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反映。“后现代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声称的某些特点的重写”(利奥塔 1997)。在语言研究方面,后现代主义追求语言研究的多视角,摒弃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追求语言研究的动态特征,摒弃静态的、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确立“意义观”,认为意义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靠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来实现和确定的某种实体或关系。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考虑词与物之间的关系,认为符号的能指不但与所指密不可分,而且还会反过来影响所指(于鑫 2003)。

纵观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语言研究的后现代特征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语言思想的发展结果。根据福柯 (2001) 对“认识形态 (episteme)”的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 (14~16 世纪),人们根据相似关系从已知中发现未知,所以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似性原则”的基础之上,语言与事物难以区分,语言如同植

物、动物一样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神秘而模糊的事物。在古典时期 (17~18 世纪),语言从存在物中退了出来,成为透明和中立的符号,此时,“意义”的概念出现了,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表征性”,即词用观念去表征事物。在现代时期 (19 世纪),表面的表征让位于对深层规律的探索,人们已不满足于建立“语法”这类词语表达事物的秩序,而是热衷于语音和语法系统中的规律。为探求词与物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应运而生。在当代 (20 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盛行,词与物被完全分离,符号仅指涉其他符号,而不指涉外界事物;语言被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体,是一个以任意性为基础的具有层级的符号系统。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季国清 1999)。

从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研究的影响来看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可以发现它们都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征。它们都摒弃结构主义僵硬的语言思想,摒弃静态的、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转向研究动态的、不确定的语言运用,认为意义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构建的结果。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后现代特征可以用 Kilpert 的“互补性”和“不确定性”(kilpert 2003)来概括。Halliday 摒弃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学说,侧重研究语言运用,并把语言系统和语言运用联系起来;根据功能主义的语言选择研究,语言功能由语境对语法规则的要求来实现,语境的变化决定语法规则的选择,意义不再是事先确定的字面意义,而是实际应用中通过语言选择来实现的功能,从而确立了意义/功能的动态特征。语用学的语言选择研究对语言运用的不确定性更是明确再三。这首先体现在选择对象的扩展。语用学的语言选择对象不是固定的语法规则,而是实际运用中范围不确定的语言要素,包括语音、词汇,也包括语言策略,甚至“活动”(action)这类非语言的交际因素也被纳入选择的范畴(Scollon & Scollon 2003)。除此之外,语言运用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语言运用的商讨性方面。语言选择是无规则可循的,有的只是可变性极强的原则和策略(Verschueren 2000)。社会语言学将语言选择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将语言选择的对象进一步拓宽到“语体(style/genre)”、“语步”(moves)、“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等,而且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目的探索也触及到研究语言选择与选择者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及其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关系,把语言研究与社会课题紧密联系起来。总之,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都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影响,带着反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特征。

■ 《外语学刊》2007 年第 6 期,约 9000 字